

# 体认翻译学视域下乡土语言英译认知解读 ——以葛浩文英译《蛙》为例

陈兆瑞, 阿力亚·艾尼  
(上海理工大学 外语学院, 上海 200093)

**摘要:** 作为乡土文学的载体, 乡土语言及其英译对中国文化走出去具有重要意义。汉学家在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中功不可没。根据体认翻译学“现实—认知—语言”的核心原则, 对葛浩文英译莫言作品《蛙》中的乡土语言翻译的体认过程进行解读, 分析乡土语言翻译策略及其翻译效果, 证实体认翻译学三层次观在乡土语言英译研究中的适用性, 并指出译者翻译的不足之处, 拓展了乡土语言翻译研究的视角, 从而为中国乡土文学对外译介与传播提供借鉴。

**关键词:** 体认翻译学; 乡土语言; 翻译三层面; 葛浩文

**中图分类号:** H 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95X(2025)03-0233-08

**DOI:** 10.13256/j.cnki.jusst.sse.230323131

## Interpreting English Translation of Folk Langu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bodied-Cognitive Translatology —A Case Study of Howard Goldblatt's *Frog*

CHEN Zhaorui, ALIYA Aini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093, China)

**Abstract:** As the carrier of local literature, folk language and its English translation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global spread of Chinese culture. Sinologists hav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core principles of Embodied-Cognitive Translatology—“reality, cognition, language”, interprets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process of “ti (embodiment)” and “ren (cognition)” of Chinese “folk language” in Goldblatt's *Frog*, analyzes th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nd their effects, justifies applicability of the cognitive tripartite division to the study of folk language translation, and identifies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translation. It is hoped that the research will expand the perspective of folk languag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folk literature.

**Keywords:** Embodied-Cognitive Translatology; Chinese folk language; three levels of translation; Howard Goldblatt

收稿日期: 2023-03-23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22YJC740002); 上海理工大学国家社科基金培育项目(21SKPY11)

第一作者: 陈兆瑞, 男, 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语言对比与翻译、翻译理论与实践。E-mail: chen\_zhaorui12345@163.com

通信作者: 阿力亚·艾尼, 女, 副教授。研究方向: 语料库翻译、话语分析、翻译教学。E-mail: aliya809@hotmail.com

近年来,围绕中国文化“走出去”开展中国文学作品英译研究成为重要课题方向。我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的文学作品的成功译介给中国当代文学外译带来启示。美国汉学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致力于中国乡土文学作品英译实践。乡土文学中包含大量富有地域色彩与民俗风情的乡土语言。葛浩文曾经指出,莫言作品中真正长久吸引读者的是其乡土色彩。因此,研究乡土语言翻译是中国乡土文学走出去的关键。体认翻译学认为语言是基于现实的“体验互动”和“认知加工”的产物,因此翻译绝不能止于语言层面,更要分析判断其背后的认知机制和对应的现实世界。鉴于此,本文以体认翻译学理论为指导,将体认三层次翻译观引入乡土语言的英译研究中,选取葛浩文英译《蛙》中典型的乡土语言表达进行三层面考察,分析译者翻译背后的“体认”过程及翻译效果,指出翻译的不足之处,以期拓宽乡土语言翻译的研究道路。

## 一、体认翻译学及相关研究

翻译研究继“文化转向”后,亦已出现“认知转向”<sup>[1]</sup>,自Martin提出“认知翻译学”(Cognitive Translatology)以来,国内不少学者如王寅<sup>[3]</sup>、卢卫中<sup>[4]</sup>、文旭<sup>[5]</sup>等开展了翻译的认知研究。王寅基于认知翻译学提出了本土化的“体认翻译学”(Embodied-Cognitive Translatology, ECT)<sup>[6]</sup>,打通了翻译学与马列主义、语言学、语言哲学、后现代哲学(含体验哲学)、认知科学等理论之间的通道,随后出版专著《体认翻译学》<sup>[1]</sup>。ECT认为翻译是一种多重互动的体认活动,译者在透彻理解原文语篇所表达的有关现实世界和认知世界中各类意义的基础上,采用多种体认方式将这些意义映射进译入语,基于创造性模仿机制将这些意义建构和转述出来<sup>[1][15]</sup>。ECT的核心原则是“现实—认知—语言”,强调从人类的“体验”和“认知”角度研究语言结构和意义,认为翻译不只是语言层面的简单转换,更重要的是要探析翻译背后的体认过程,意在描写和解释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运用的体认方式,如感知觉、意象图式、范畴化与概念化、隐转喻、概念整合、识解、像似性、事件域认知模型等<sup>[1][24]</sup>。“体认”凸显了语

言研究的体验性和人本性,是唯物主义和人本主义的有机结合。“体”彰显了哲学中的唯物论,坚持语言的互动体验观,可以用来阐释翻译中的“同”和“模仿”;“认”强调人的认知加工和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可以用来说明翻译中的“异”和“创造”。语言的意义只有在“体”和“认”二者的辩证互动关系中才能获得,是主客观相统一的理论典范,这就是ECT所倡导的“意义的体认观”。

当前,翻译研究的重点转向了翻译过程,这就更加需要借助体认翻译学理论来解释翻译现象,揭示各种心智机制在翻译过程中是如何运作的。王寅以体认语言学核心原则为指导,提出了汉语成语英译的三层次观,分析了《红楼梦》3种译本中的成语在现实、认知和语言三层面上的翻译方式,对比分析了其英译认知过程<sup>[7]</sup>。高文成等对《离骚》霍克斯译本中的文化负载词的英译进行了三层面的分析,证实体认语言学三层次在文化负载词英译研究中的适用性<sup>[8]</sup>。胡安江等从ECT视角,对美国诗人Peter Stambler的寒山诗英译进行了体认考察<sup>[9]</sup>。目前ECT视角下的个案研究涉及成语、文化负载词和诗词等,研究的对象领域有待进一步拓展。

## 二、乡土语言英译研究

作为乡土文学的载体,乡土语言及其翻译和传播研究是中国向世界阐释语言民族性、拓展语言世界性的关键路径<sup>[10]</sup>,对于中国文化走出去具有重要意义。乡土文学中的风土人情、风俗习惯是通过乡土语言加以表现的,是对特定的时代、区域和文化传统的反映,是一个民族最朴素的文化缩影,研究乡土文学的翻译必须研究乡土语言的翻译<sup>[11]</sup>。周领顺最早提出将“乡土语言”作为译学研究中的术语,认为乡土语言是对熟语、惯用语、谚语、歇后语、俚语、成语、格言、俗语和方言的高度概括,指出开展乡土语言翻译研究意义有三:一是乡土语言是乡土文学的命脉,研究乡土文学英译离不开对乡土语言英译的探讨;二是彰显个性的“土”文化值得被推广;三是作为汉语表达的一部分,乡土语言符合汉语对外传播的需要<sup>[11]</sup>。葛浩文认为“最初引起读者共鸣的

不外是民族主义的主题,但是构成其长久吸引力的却是它们的乡土色彩。”<sup>[11]</sup>莫言曾指出,中国文学作品外译的困难在于“乡土味”翻译的准确性<sup>[12]</sup>。乡土语言彰显了乡土文学的乡土性,是中国当代乡土文学译介的难点。

周领顺等基于译者行为批评视角,讨论了乡土语言英译的“求真”与“务实”<sup>[13]</sup>。杨莎莎基于语料库的方法对《生死疲劳》中乡土语言的英译策略进行研究<sup>[14]</sup>。邵霞等以《到黑夜想你没办法》英译本为例,研究了乡土语言的英译策略与中国乡土小说的接受情况<sup>[15]</sup>。刘彭恺等基于翻译批评视角,对贾平凹《浮躁》中的乡土语言英译存在的误读和误译问题进行了分析<sup>[16]</sup>。黄勤指出,乡土语言以往研究多倾向于考察乡土语言的文化负载作用,忽视了其“土气息”和“泥滋味”,且多强调静态的乡土语言本体研究,缺乏对动态的乡土语言外部因素的关注<sup>[10]</sup>。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由于时空的差别,人们形成了不同的认知世界的方式和结果。不同民族对于同一事物的体验和认知的异同最终会体现在语言上。要窥得翻译的真谛,必须关联翻译背后的体认机制和现实世界,而乡土语言英译必定涉及译者的体验和认知。上述乡土语言翻译研究多探讨译者的翻译策略或技巧,分析翻译状况,缺少系统梳理和定量分析,鲜少学者从体认翻译学视角对译者英译乡土语言的体认过程进行解读。

鉴于此,本文以体认翻译学的“现实—认知—语言”三层次观为观照,选取《蛙》中的乡土语言作为语料,建成双语语料库,分析葛浩文在乡土语言英译中的翻译方式及其效果,从译者对物理世界的“体验互动”和心智世界的“认知加工”的视角分析英译过程背后的体认操作,以验证体认三层次翻译观的适用性和解释力,为乡土语言的翻译研究范式提供新视角。

### 三、研究设计

#### (一) 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莫言作品《蛙》为研究对象。该小说以新中国近60年的农村生育史背景为参照,讲述了在山东高密一位从事妇产科工作50多年的乡

村医生姑姑跌宕起伏的人生故事,地域特色鲜明,乡土气息浓厚,曾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蛙》这一题目颇有深意,一语双关,“蛙”与“娃”和女娲的“娲”同音。女娲造人,青蛙寓意多子,“蛙”这一物象是对“高密东北乡人民”的隐喻,以“蛙”喻“娃”,象征高密人民在这块乡土上繁衍生息。《蛙》中包含大量的乡土语言,隐喻修辞无处不在,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某些约定俗成的认知。美国汉学家、翻译家葛浩文文学功底深厚,对于中国乡土文学外译的贡献可见一斑,他于2014年翻译出版了莫言作品《蛙》(*Frog*),在国外颇受推崇。

#### (二) 研究问题

(1) 葛浩文在乡土语言英译过程中基于哪个翻译层面的操作较多?每个层面所占比例如何?

(2) 译者认知操作背后的动因是什么?

#### (三) 研究步骤

首先,根据尤金·奈达关于文化词的分类<sup>[17]91</sup>,乡土语言可归纳为生态文化词、物质文化词、社会文化词、宗教文化词和语言文化词五大类。然后,笔者对《蛙》中的乡土语言进行了细致梳理,共得到166项。生态乡土语言囊括动植物、地理环境、气候等具有生态特征的词汇,如河心水、泰山顶上一青松等;物质乡土语言表现为饮食服饰、交通工具、生产工具等,如石碌碡、煎饼鏊子、饽饽等;社会乡土语言指向政治制度、社会风俗习惯、历史背景和社会思想等,如车把式、牛鬼蛇神、苗红根正等;宗教乡土语言涵括宗教信仰、神话传说等,如活阎王、娘娘庙、长命锁等;语言文化乡土语言则表现为方言、惯用语、歇后语、俚语、谚语、习语、格言等,如抬杠、小兔崽子、落时的凤凰不如鸡等。最后,文章从体认翻译学的视角分析葛浩文翻译背后的体认操作及其动因。

### 四、葛译《蛙》乡土语言翻译三层面的体认解读

语言必然像似于认知,且在认知作用下在一定程度上像似于现实<sup>[1]307</sup>。乡土语言作为语言的一

种表现形式,深深扎根于人们的生活环境之中,其形成涉及“现实、认知、语言”三要素。人们通过感知觉,接触到自然或社会中的若干现象,从中获取各种信息,形成意象图式,继而范畴化和概念化,建构体认模型,同时获得了意义<sup>[1]330</sup>,并通过“体认”将获得的观念固定于词语表达之中,这一过程叫“词汇化”。ECT认为原文和译文都是基于体验互动和认知加工的活动。当译者读到乡土语言时,需要透过字面意义,根据语境获取与之对应的认知意义(原型意义),从而再现作者笔下的现实情境,这一过程也涉及“语言—认知—现实”三要素<sup>[1]333</sup>。因此,译者可以从“语言层面”“认知层面”“现实层面”中选择一或两个层面作为翻译实践的主要依据,即在语言层面直接译出乡土语言的字面意义,或在认知层面还原其原型意义,或在现实层面再现其语境或语用含义<sup>[1]</sup>。当然,除了“单一范畴”的翻译处理外,亦可从“融合范畴”出发,即选择某两个层面的有机结合<sup>[8]</sup>。这就是乡土语言翻译的三层次观,见图1(引自王寅<sup>[1]333</sup>,略有改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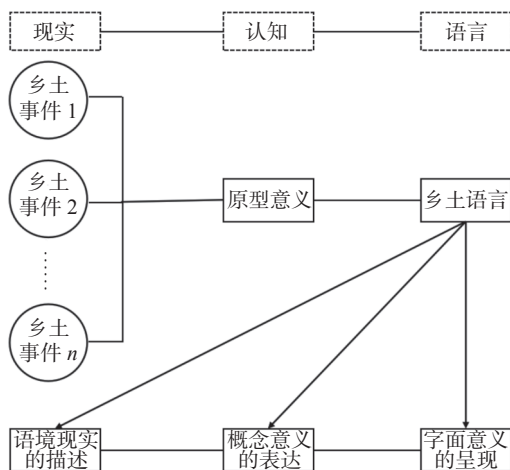


图1 乡土语言翻译的三层次观

Fig. 1 Three levels of folk language translation

### (一) 语言层面

体认翻译学<sup>[1]</sup>认为直译和意译之别受制于“体认”方式的不同,而这两种译法都涉及“体”和“认”。语言层面的翻译主要是依据原文的字面意义照直译出,译文形式与原文对应程度较高,更加强调直觉性的“体验”。鲁迅主张直译,译文应尽量保存原作的洋气,有异国情调。乡土语言中蕴含许多意象,“土味”的再现是乡土语言

翻译的更高层次<sup>[12]</sup>。直译法可以最大程度地保留乡土语言的“土味”和“俗气”。中国乡土文学“走出去”并不是非要“削足适履”以迎合目的语读者的审美习惯和价值观。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深入,译者在翻译时适当选择语言层面的处理以保留原作的语义和语法特征,可以让外国读者了解东方语言文字的情调韵味,有利于加深其对中国文学作品的理解。

意象是“意”和“象”的融合,分别对应于主观概念和客观物象,象显而意隐。移植式翻译类似于异化翻译,把原文中的隐喻形象直接移入目的语中,保留原表达的意象结构图式。新的体认模式被移植到目的语中,有利于新文化元素的渗透<sup>[18]</sup>,再现原文的思维方式。译文之“同”出于“体”<sup>[6]</sup>。不同民族基本相同的体验性决定了思维的共通性,使语言的可译性成为可能。而对于乡土语言等文化专有项,翻译也应遵循减少译语读者认知努力的原则,建立较好的关联。王斌指出,同一隐喻表达如果在目的语文化中不产生语用交际冲突,移植式隐喻是难得的翻译手段,是对语言个性化和意象完整性的忠实<sup>[18]</sup>。

例1 早就听说你们回来了……正是,狐死首丘,落叶归根<sup>[19]185</sup>。

译文 I heard you were back... That's right, I said. *A fox dies in the den where it was born, a leaf falls to the ground right below*<sup>[20]217</sup>.

译者翻译时考虑了隐喻自带的认知属性,即译文是否可以为读者提供足够的心理可及性。此处,“狐死首丘,落叶归根”是对《蛙》中的“蝌蚪”(小说叙述人“我”)的隐喻,“狐死首丘,落叶归根”是源域,小说叙述人“我”是目标域。人们在与现实世界互动的过程中看到了三种现象:狐狸死后头部朝向其洞穴;树叶落在树下滋养树根;客居他乡的游子最终回到故土。由于这三种情形的相似性,人们自然将它们联系在一起,形成约定俗成的表达。译者在解构原文概念后,发现源域与目标域在汉英两个民族之间有着相似的体验和认知,可以激活同样的隐喻场景且映射方式相似<sup>[21]</sup>,故采取直译策略保留意象,从而使目的语读者激活的文化、认知形象与原语读者相似。

据统计,葛浩文英译乡土语言时,基于语言

层面翻译的考量较多,其目的是在不造成理解障碍的情况下,尽可能地保留乡土文学的灵魂——“土味”,如:“强扭的瓜不甜”译作“A melon won't be sweet if you yank it off the vine”;“瞎子点灯——白费蜡”译作“A blind man lighting a candle, just wasting wax”。这些译文凝聚了汉民族的认知和智慧,打上了文化烙印,可看作是向世界阐释其民族性的重要途径,以此促进不同民族之间思维的碰撞,丰富了译语表达。这种异化译法忠实于原文,可以增加译语的陌生化效果,同时不至于让目的语读者难以理解。

## (二) 认知层面

“认知”强调客观世界需要经过人的大脑才可能被认识。体认翻译学强调“体”和“认”的辩证互动统一,“人之认知”是“现实世界”与“语言表达”的必由之路<sup>[1]</sup>。乡土语言是特定时代、特定区域和特定文化的产物,其形成过程离不开人的“认知加工”,所以译者翻译时可以从认知层面进行翻译以规避不同民族间的认知差异。译文之“异”归因于“认”<sup>[6]</sup>,其中也有“体”的因素。由于有些乡土语言带有明显的民族特征,译语民族存在“经验空缺”,译文不一定符合读者的阅读期待。译者采用意译,旨在挖掘文字表征下的内涵,并用适切的语言表达出来。此时,“认知”机制会起主导作用,译者采取隐转喻的认知策略,使得读者所付出的认知加工努力会比较多。例如,“香火”译为“male heir”,显化了传宗接代之意。可见,通过更换意象来反映认知意义,能够产生更贴近目的语读者的译文,但可能给译者带来较大的认知心理运算压力。

例2 那时候,我是活菩萨,我是送子娘娘<sup>[19]22</sup>。

译文 I was a living Buddha back then, the local stork<sup>[20]26</sup>。

认知语言学认为,翻译可以从认知结构的角  
度被纳入概念整合网络<sup>[1]</sup>。翻译过程并非源语直接转换为译入语,而是译者在原文和译文认知框架制约下的主观选择过程。非对等映射是指在两种文化中,目标域和源域之间的映射关系所形成的层创结构,以及所激活的文化、认知形象存在一定差异<sup>[21]</sup>。“送子娘娘”是中国民间宗教信仰中

掌管生子的神,译者没有囿于原文,而是更换意象,借用译语中已有的“stork”(送子鹤)表达源语的隐喻意义。虽形象不同,但喻义相似,“貌离而神合”,译文和原文在文体价值和美学效果上实现了较高的体认像似性和审美连贯性。又如,“一箭双雕”译为“two birds with one stone”,将源语文化里的修辞认知转换为译语读者容易接受的修辞认知,此类处理保留了原文的文学性。

各民族“认知加工”方式的不完全相同致使在语言表达上有所差异,出现了部分难以翻译或不可译的现象<sup>[1]22</sup>。如“才高八斗”“名登金榜”“紫袍玉带”,这些成语源于现实,与中国古代的社会制度、社会思想息息相关,是中国古人体验和认知的结果。鉴于原文表达具有较强的文化个性,这些成语抗译性较强,译语读者未必能在记忆里激活类似的认知和语义联想,译者抛去物象,跳出语言桎梏,将以上三词译为:“accomplish great deeds”“rise to unprecedented heights”“be invested with all the trappings of authority”。读者阅读后虽能理解,但“土味”荡然无存,导致了一定的审美磨损。乡土文学中文化元素的译介,可以让译语读者在阅读中邂逅中国文化,了解中国人民的生活状态,实现人类文明互鉴。因此笔者认为,可以采用厚译法,添加注释,保留原文的修辞认知。

## (三) 现实层面

翻译既是认知活动,也是交际活动。体认翻译学沿袭了认知语言学的理论,认为范畴和概念的形成离不开人在现实世界的体验和认知,强调语言源于实践,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人们在翻译时需要分析形成认知机制的现实环境。乡土语言来自人的生活经验和客观现实,其表达形式被最终固定下来用以表示现实场景。译者在获取语言字面意义后,进而在大脑中显化其概念意义或原型意义。原型意义能与特定的上下文语境相结合,译者可根据语境中的具体事件,进行现实层面的语境化翻译。例如,“活阎王”形象原为男性,小说中译为“Living Queen of Hell”,最大限度地激活了姑姑在西方读者心中雷厉风行、心狠手辣的形象。

例3 否则,她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sup>[19]43</sup>。

译文 Without it, she could not have recaptured her good name even if she'd jumped into the cleansing waters of the Yellow River<sup>[20]50</sup>.

“跳进黄河也洗不清”是一句家喻户晓的中国俗语。根据汉民族的体验认知,黄河水极为浑浊,即便跳下去也难以洗清污垢。此语后来指难以逃脱干系,避免嫌疑。葛浩文译文中保留了中国人的“母亲河”黄河的意象,并着眼于美好,预设黄河之水是清澈的(the cleansing waters),以暗喻姑姑冤枉之深;又将其与当下的现实场景结合起来,用“could not have recaptured her good name”来表示“洗不清”的含义。如此翻译更为准确地传递了原文要旨,较好地保留了原文的语用效果。又如“别卖关子了”,葛浩文关联了语境现实(聆听者的不耐烦)和俗语的意义,译为“The suspense is killing me”。译文直指具体的现实层面,但失去了乡土语言的含蓄性,留给读者思考的空间变小了。

#### (四) 融合范畴

关于乡土语言隐喻表达的译法,主要有三种:保留原文的隐喻;意译出原文的隐喻意义;套用译语中的隐喻。有时也可结合其中两种译法。在《蛙》中,译者较少采用融合范畴译法,即融合“现实”“认知”和“语言”任二层面进行翻译,这样可以更好地实现翻译准确度和文学色彩统一的目的<sup>[8]</sup>。语言层面的翻译有时只能传达其表层含义,而认知层面的处理虽显化了概念认知意义,但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原文的文学性,所以需要结合这两个层面进行翻译补偿。原文中的“好心当成驴肝肺”,译者处理成了“turn good will into donkey's guts, pure malice”,“pure malice”强化了“驴肝肺”的修辞含义。此种译法实则需要译者付出更多认知加工的努力。以下例4实现了语言和认知层面的结合。

例4 那是他剃头挑子一头热,小狮子并没说要跟他好<sup>[19]155</sup>。

译文 His love for her is a one-sided affair, like a barber's carrying pole—only the pail on one end is hot. Little Lion never once expressed any interest in him<sup>[20]184</sup>.

乡土语言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模糊性,虽然

可应用在许多实际场景,但难免因缺失一些关键信息而导致交际失败。为使其认知意义更为具体直观,译者往往会增添一些解释信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此种译法可称为“显化”。“剃头挑子一头热”是一厢情愿之意。译者保留原意象而直译的同时,在译语中找到与原文格式塔的形、象、意皆高度相关的意象,最终形成译语的意象表征<sup>[9]</sup>,套用英语中的“one-side affair”明晰化其认知意义,既较大程度地保留了小说的“土味”,又能促进语用效果,一举两得。

#### (五) 研究结果及动因分析

基于翻译的三层次观,对葛浩文译本中的166处乡土语言的英译进行了层面划分(表1),结果表明:在《蛙》中,译者多从单一范畴出发,其中语言层面占比较大,即在异化翻译策略指导下的直译较多,高达47.59%;认知层面(一般指意译)和现实层面次之,分别占33.13%和12.65%。单一范畴的翻译呈现出“倒三角形”的蕴含等级<sup>[8]</sup>,符合人的认知心理加工过程,即:基于直译的语言层面所涉及的认知操作最少,保留了原汁原味的中国乡土文化;上升到概念意义或原型意义的认知层面,译者则需进行较多的认知操作以达到理解全文的效果;最后的现实层面因情境而定,适时变通,需付出更多的认知努力来实现语用和语义的兼顾。单一范畴的翻译表明了从语言到认知再到现实,译者所付出的认知努力是逐级递增的,而融合范畴的实践较少(占5.42%)。有时,仅靠一个翻译层面很难完整地表达乡土语言的意义,译者可以结合两个层面以更好地传达源语的含义,但这一操作需要译者付出更多的努力,且译文往往略显赘余。在《蛙》中,译者较少使用删减或省译来处理乡土语言,说明其更为注重原作风格和特色的保留。但笔者注意到,译者为避免“文化空缺”或上下文重复,将“助纣为虐”“皮策篱”等省略不译。此外,葛对《生死疲劳》中文化负载词的直译、意译策略应用分别占比为48.70%、28.70%<sup>[14]</sup>。这些数据有效地佐证了葛浩文在乡土语言翻译时的心智运作规律,符合体认翻译学的“创仿”原则,即以“仿”为本,“创”而有度,能仿则仿,不能仿再考虑“创”<sup>[6]</sup>。“仿”(模仿)针对源文,以“体”为本,翻译应紧扣原义和主旨;“创”(创造性)针对译文,

由“认”来保证,允许译者有一定的创作自由度,从而发挥译文优势以做到较好的“映射”<sup>[1]9</sup>。

表1 《蛙》葛浩文全译本在乡土语言翻译层面的分布  
Tab. 1 The distribution of folk language translation level of *Frog* by Goldblatt

| 翻译范畴 | 翻译层面      | 数量 | 占比(%) | 总数  | 总占比(%) |
|------|-----------|----|-------|-----|--------|
| 单一范畴 | 语言层面      | 79 | 47.59 | 155 | 93.37  |
|      | 认知层面      | 55 | 33.13 |     |        |
|      | 现实层面      | 21 | 12.65 |     |        |
| 融合范畴 | 语言层面+认知层面 | 9  | 5.42  | 9   | 5.42   |
| 省译   | —         | 2  | 1.21  | 2   | 1.21   |

统计数据表明,在翻译过程中,葛浩文认知努力的多少与乡土语言的翻译效果并非成正相关。翻译层面的确定从根本上取决于译者对“三要素”之于乡土语言的影响的判断与衡量<sup>[8]</sup>,从而实现其一系列认知操作背后的翻译目的,即更好地向译语读者呈现文字的“土味”和“俗味”,尽力保留中国文化元素。研究发现,译者对不同翻译层面的选择会影响翻译效果。首先,汉学家葛浩文重视还原乡土文学的“民族味道”,因此基于语言层面的翻译占比较大,即通过异化策略指导下的直译起到文化输出的作用,保留原文化中的“异质”。这说明英汉民族中的许多意象或形象是共享的,两个民族的思维具有相通性。从某种程度上讲,译文越忠实于原文,说明外国读者越想了解真实的中国。其次,译者注重译文的可接受性。由于乡土语言承载着丰富的民族文化,有些抗译性很强的修辞认知,很难移植到译语文化中,故译者退而求其次,通过意译再现原语的概念认知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原作的文学性。此外,译者结合语言层面和认知层面,生成既符合读者的认知理解需求,又准确地传递中国文化元素的译文。总之,译者对乡土语言的翻译方法,直译与意译并举,对翻译策略的选择是异化多于归化,力求保留原作的文学性,忠实于原文。

葛浩文译文也有不足之处,如“饽饽”译成“corn muffin”实有不妥,“muffin”指小蛋糕,显然不符合“饽饽”所指。有些语意偏离或大胆“改写”实为译者出于读者接受的考虑对原文做出的创造性重构,例如,“麒麟”译为“unicorn”,

“煎饼鏊子”译为“fry an egg”。成功的译介应该是对原作特色和精华的保留。乡土语言翻译要践行“人本观”和“体验性”,以中国社会的乡土本色为观照,选择合适的翻译层面。翻译的最终归宿是将中国文化充分传译出去(“通事”),同时满足译语读者的认知需求(“通心”)。总之,译者在乡土语言翻译过程中要经历从“归化合理”到“异化有理”的转变过程<sup>[10]</sup>。随着世界各国文化交流的日益密切,读者渴望获得更多的外来文化,译者应提升乡土语言翻译和研究水平,助力中国优秀文化走向世界舞台。

## 五、结语

乡土语言相似于认知,承载着地方性思维记忆,是乡土小说的特征之一。本文基于乡土语言的形成过程,依据体认翻译学“体”和“认”两原则,剖析了乡土语言英译过程中的体认机制,借助实例分析了各层面的翻译操作及效果。乡土语言将基于语言层面的翻译作为最基本的翻译方法,是异化或直译的主要途径;认知层面的翻译活动要求译者揭开文字表象并挖掘其深层意义,这一操作意味着放弃利用意象进行隐喻认知加工的策略,直接显化其修辞的语用含义,其目的是减少译语读者对语言推导做出更多的认知努力,属于意译法;现实层面的翻译要求译者付出更多的认知加工努力,这一策略兼顾源语的认知意义和小说具体场景的语用意义。数据分析表明,译者在翻译中力求采用直译的方法最大限度地保留乡土语言中的文化元素,以求真于原文。而当直译不能激活译语读者与原文读者相似的认知时,适时变通,通过意译再现原文内容,以忠实于读者。

乡土语言的“土味”的传达要求译者在通晓中华文化的同时,还要具备深厚的英语语言功力。中国现当代乡土文学外译既要“借帆出海”,也需自扬其声”。西方汉学家虽有语言优势,若不熟稔中国传统文化,不免对原文语言理解有些许差池。未来乡土文学外译可以引入本土翻译家,取长补短以避免类似问题。无论是汉学家还是国内译者,翻译时都应该做到三个方面:必须准确理解乡土文学作品中的语言的含义;必须设法呈现原作文字的味道;必须尽力保留作品中的中国文

化元素<sup>[16]</sup>。上述要求对“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具有重要意义。

#### 参考文献:

- [1] 王寅. 体认翻译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1.
- [2] MARTIN R M. On paradigms and cognitive translology[C]//SHREVE G M, ANGELONE E. Translation and Cognition.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10: 169 – 187.
- [3] 王寅. 认知翻译研究[J]. 中国翻译, 2012, 33(4): 17 – 23; 127.
- [4] 卢卫中, 王福祥. 翻译研究的新范式——认知翻译学研究综述[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3, 45(4): 606 – 616.
- [5] 文旭. 认知翻译学: 翻译研究的新范式[J]. 英语研究, 2018(2): 103 – 113.
- [6] 王寅. 体认翻译学视野下的“映射”与“创仿”[J]. 中国外语, 2020, 17(5): 37 – 44.
- [7] 王寅. 体认语言学视野下的汉语成语英译——基于《红楼梦》三个英译本的对比研究[J]. 中国翻译, 2019, 40(4): 156 – 164.
- [8] 高文成, 吴超异. 体认语言学视野下《离骚》中文化负载词的英译研究[J]. 语言与翻译, 2021(2): 42 – 50.
- [9] 胡安江, 彭红艳. 美国诗人 Peter Stambler 寒山诗英译的“体认”考察[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22, 54(2): 298 – 307.
- [10] 孙美娟. 提升乡土语言翻译研究新境界[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2-09-28(001).
- [11] 周领顺. “乡土语言”翻译及其批评研究[J]. 外语研究, 2016, 33(4): 77 – 82.
- [12] 秦毅. 文学作品翻译“走出去”是必然[N]. 中国文化报, 2016-06-23(002).
- [13] 周领顺, 周怡珂. 汉语“乡土语言”英译的“求真”与“务实”——基于葛浩文翻译实践的讨论[J]. 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7, 21(6): 103 – 109.
- [14] 杨莎莎. 基于语料库的《生死疲劳》中文化负载词英译研究[J]. 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2016, 30(10): 126 – 130.
- [15] 邵霞, 马会娟. 中国乡土小说中的文学方言英译与接受研究——以《到黑夜想你没办法》英译为例[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1, 44(2): 74 – 82.
- [16] 刘彭恺, 党争胜. 贾平凹作品英译建言: 基于对《浮躁》英译本的批评[J]. 外语教学, 2022, 43(6): 89 – 93.
- [17] NIDA E A. 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ng[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1993.
- [18] 王斌. 隐喻的翻译和隐喻式翻译[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0, 18(4): 91 – 96.
- [19] 莫言. 蛙[M].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20.
- [20] GOLDBLATT H. Frog[M]. Australia: Penguin Group, 2014.
- [21] 陈璐. 认知视角下主题隐喻的翻译研究——以葛浩文《红高粱》译本为例[J]. 上海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44(4): 359 – 365.

(责编: 朱渭波)